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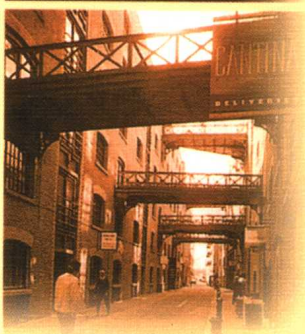
●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城市历史 街区的复兴

Revitalizing Historic Urban Quarters

[英] 史蒂文·蒂耶斯德尔 蒂姆·希思 著
[土] 塔内尔·厄奇

张玫英 董 卫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ITY PLANNING & DESIGN THEORY

STEVEN TIEDELL • TANER OC • TIM HEATH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

[英] 史蒂文·蒂耶斯德尔 蒂姆·希思

著

[土] 塔内尔·厄奇

张玫英 董卫

译

董卫

译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3-11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英)史蒂文·蒂耶斯德尔等著;张玫英、董卫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ISBN 7-112-08039-8

I.城... II.①史... ②张... ③董... III.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 IV.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8868号

©Steven Tiesdell, Taner Oc, Tim Heath 1996

This edition of revitalizing Historic Urban Quarters by Tim Heath, Steven Tiesdell, Taner Oc, SA Tiesdell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lsevier Science Ltd, The Boulevard, Langford Lane, Kidlington, OX 5 1GB, England

本书由英国 BUTTERWORTH-HEINEMANN 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策 划:王伯扬 张惠珍 黄居正

责任编辑:程素荣 率 琦

责任设计:郑秋菊

责任校对:董纪丽 王雪竹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

[英] 史蒂文·蒂耶斯德尔 蒂姆·希思

[土] 塔内尔·厄奇

张玫英 董 卫

董 卫

著

译

译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制版:北京嘉泰利德制版公司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4 3/4 字数:300千字

2006年4月第一版 200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48.00元

ISBN 7-112-08039-8

(1399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前言

许多城市都有以浓郁历史文化氛围见长的街区,它们营造出特有的场所感和认同感,构成城市魅力与活力的重要部分。这些街区的形象特征和功能品质都与城市整体密不可分。因为这些街区通常都位于城市中心区,所以它们的振兴实际上也就是城市的振兴。吸引更多的就业、商业、旅游机会,更重要的还有居住活动,是内城振兴并与其他城市街区整合的重要指标。

长期以来,历史街区的品质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就在20世纪60年代,它们还被认为只是破旧不堪的地方,应当予以拆除并实施综合性开发。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开始着手对它们进行历史保护。但由于不能把所有的历史街区都变为博物馆或博物馆区,所以还是要想方设法振兴这些街区,使它们融入到城市的整体功能中去。历史街区的保护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简单化的注重限制性保存措施的制定到以后的推动街区振兴与整合的演变过程。所谓振兴就是通过经济的发展为街区保护、维护和改善提供财政支持。这意味着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其一是街区固有传统活动的改变;其二是重建街区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的重建又需要明确区分“功能的”和“物质环境的”这两种不同的保护方法。

各种振兴措施都需要在一个十分敏感的文脉和环境中展开,这既是一种限制条件,也是一种激励因素。所有的城市街区都在发生变化,而历史街区的变化就是在发展经济所导致的变革与保护需求对物质环境所作出的限制之间寻求平衡。这对设计和开发的品质以及建筑空间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都对诸如如何处理各种紧迫的保护与振兴的要求,以及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尊重历史环境等难题提出了挑战。本书对这些涉及到城市设计(urban design)与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的种种难题进行了探讨。当代城市设计的基本理念是创造场所感和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所以一个好的城市街区也就代表了一种好的城市设计方法。

本书试图通过对一系列历史街区振兴案例的分析,将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予以综合考虑。来自北美和欧洲的个案分析展示出多样性的城市振兴策略及其成果,从这些历史街区的经验中所获得的方法与思考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内容。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历史街区,即那种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内集中了相当多的历史建筑的地区,以及以场所和地区为指向的各种城市设计与规划方法,书中并未涉及针对单体建筑的保护和修复方法。

致 谢

我们要感谢诺丁汉大学城市规划系的很多学生,他们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贡献了一些实际的研究素材。下面是感谢名单: Caroline Bond, Helen Burley, Carly Gorten, Suzy Harrison, Alex Lewis, Anna Raymond, Graham Stark, Matthew Stock 和 Richard Wilson。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不同的案例研究中付出时间或提供信息的人们。我们要感谢琳达·弗兰西斯、萨拉·肖和詹尼·塞姆博斯等人在本书制作过程中所提供的诸多帮助,特别要感谢蒂姆·劳埃德和奥利弗·莫里斯对第二章提出的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见,以及感谢戴夫·安塞顿为我们提供方便并在芝加哥设置邮箱。

我们感谢史蒂文·桑顿制作的插图和 Glynn Halls 加工并冲印了所有照片。大多数插图和照片都归作者所有,还有一些经过重绘:图 2.1 由 Orhan Tuncay 制作,图 3.5 和图 3.6 的使用得到了伯明翰市议会规划部门善意的许可。

作者简介

本书的每位作者都是建筑师或规划师。史蒂文·蒂耶斯德尔(Steven Tiesdell)毕业于诺丁汉大学,目前任职于该校城市规划系。他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城市设计、城市更新与住宅,是《城市设计:装饰与装修》一书的作者之一。塔内尔·厄奇(Taner Oc)先后就读于中东技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目前是诺丁汉大学城市规划系系主任。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城市设计、城市更新与安全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装饰与装修》一书的作者之一以及《城市规划问题研究》第一册和第二册的主编之一。蒂姆·希思(Tim Heath)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目前任职于诺丁汉大学城市规划系,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与计算机辅助设计。

目 录

前言

致谢

1 城市历史街区的振兴	1
2 城市历史街区面临的经济挑战	20
3 重新评估城市历史街区的品质	46
4 以旅游和文化产业为先导的振兴	68
5 以住宅建设为先导的城市振兴	97
6 工业及商业街区的振兴	130
7 城市历史街区中的设计	166
8 走向成功的历史街区的振兴	200
参考文献	213

城市历史街区的振兴

引言

妥善处理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对许多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历史地段和历史街区的重要性再次得到了人们的重视。第一次历史保护运动的基本策略是保护单体建筑、构筑物和其他遗迹，这种保护往往具有民族主义或宗教背景。建筑和其他遗迹受到保护的原因是它们与国家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关，或如在英国和法国那样，与教区教堂所确立的教义相关。这些早期的保护策略的作用相当有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被保护建筑周边的随意开发对历史建筑造成了破坏。亚当·弗格森（见 Appleyard, 1979年）指出：尽管巴斯的一些历史建筑得以保存下来，包括新月形的皇家建筑、马戏场、水泵房等，但是它们的文脉却处于消失的危险中。如同高山没有了山脚，古老的建筑失去了构架。布达的希尔顿饭店（the Hilton Hotel, Buda）就是这样一个破坏了城市历史文脉的例子（图 1.1）。

不久以后，这种对保护历史建筑环境的关注就扩大到了基于地区的层面上。于是，第二次历史保存思潮或更确切地说保护运动的重点就转移到了历史建筑群、城市景观和建筑环境。保存（preservation）一词的词源意为“封存”，强调对变化进行限制；而保护（conservation）则强调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需对其进行控制。在英国，这种区别明显地表现在保护区的法定意义上：保护区即“那些具有特殊建筑或历史价值并值得人们去保存或强化其历史特征的地区”（城市修复法案，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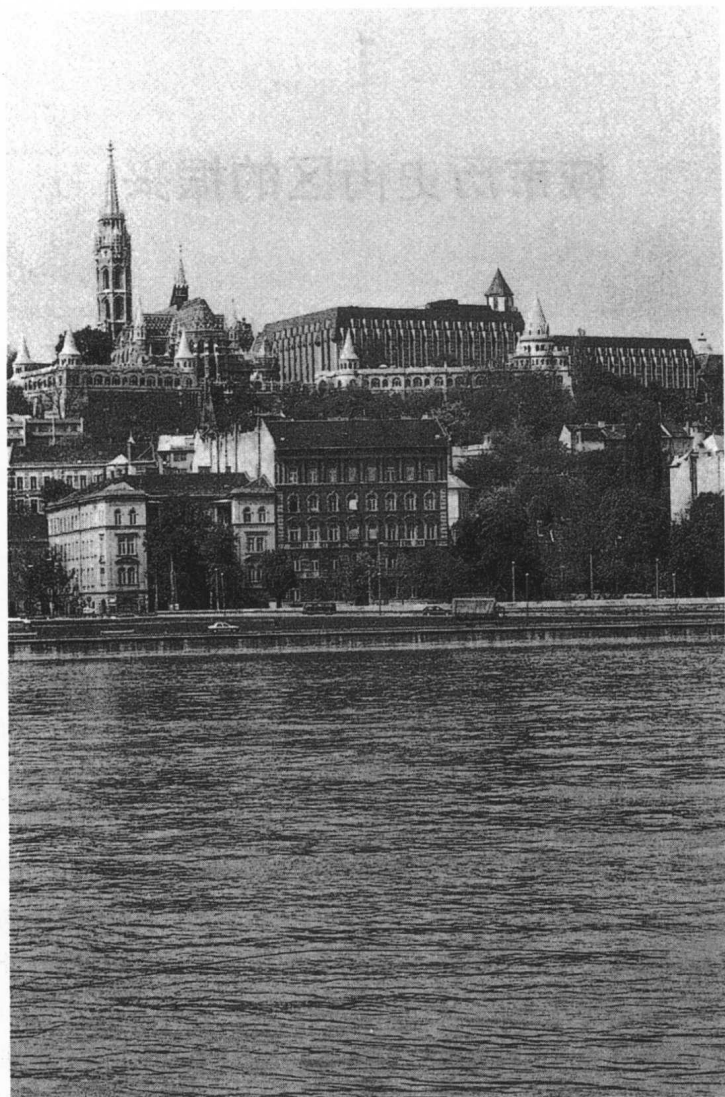


图 1.1

布达的希尔顿饭店的设计与玛塔亚教堂 (the Matyas Church) 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并产生了破坏作用。

基于地段的保护是针对社会、文化、物质环境遭受破坏而产生的反应，其原因在于战后的拆除与综合性开发政策，还有后来的道路修建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出现了地区性的保护政策。1961年的荷兰历史古迹法案是第一个，接着是法国的“马尔罗法”(Loi Malraux)。1967年英国颁布了城市修复法，同年还有意大利的城市规划法，然后是1973年土耳其的遗址与历史建



图 1.2

创建于 1933 年的新奥尔良维尔克斯·卡尔是美国的第二个历史保护区。

筑法案。美国在二战前已有好几个历史保护区。1926 年，在威廉斯堡建立了一个私营的保护区，约翰·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投入数百万美元成功地将这个小镇变成了一座博物馆。1931 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理斯顿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建立了一个名为巴特雷 (Battery) 的保护区。正如摩塔 (Murtagh, 1992, p.51) 所指出的：“这种方式标志着美国保护思想的一个重要时刻，即关注非博物馆式的历史环境，并将其作为保护的前提”。1933 年在新奥尔良的维尔克斯·卡尔 (Vieux Carre) 创立了另一个保护区 (图 1.2)。然而直到 1966 年国家历史保护法案的颁布，才意味着保护工作被置于联邦法规的控制之下。

划定保护区或历史保存区意味着要承担更广泛的公共管理责任。“保护建筑或地段一旦由法规加以认可或默许，就意味着无法衡量其直接的公共成本……，也就是说，要维持这种地位就必须把这个地段加以整体维护、改造或重建。而这一责任是永无止境的” (Ashworth and Tunbridge, 1990, p.16)。所以，这些街区的保护和保存仅仅依靠公共开支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保护区的划定是以其整体价值为评价标准，而不侧重于单体建筑或构筑物的优劣，第二次保护运动就使更多

的世俗和普通的历史建筑得以保护。这些建筑不可能都成为博物馆,也难以通过保护对街区经济形成直接贡献,或形成与保护有关的旅游业,因此应当创造出一种可行的具有经济效益的使用方式。伯滕肖等人(Burtenshaw et al. 1991, pp.157~158)注意到,为保护建筑寻求的新功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城市被迫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博物馆而存在”。所以除了视觉的、建筑的和历史的品质外,对地区功能特征以及对保护建筑有利的经济功能的考虑应作为保护的重点。“外观形式的保存与城市功能具有关联性,保护因此成为城市管理的一种方式”(Burtenshaw et al., 1991年, p.154)。

在大多数国家,第二次保护运动中的政策和法规是在经济稳步发展时期制定的。正如阿什沃思和特布里奇(Ashworth and Tunbridge, 1990, p.17)所宣称的,“把保护规划者的任务看作是控制和疏导各种对城市空间的竞争性需求是有道理的。”在许多国家,这项政策实行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和财富贬值时期,从而阻止了拆除和再开发计划的实施,所以对保护很有利。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内城历史建筑的品质在整治——以及其后的绅士化——运动中得到认可,也因此躲过了被推土机摧毁的厄运。然而这次经济衰退也抑制了人们推动经济增长以促使保护区恢复活力的各种努力。新的保护法规忽视了对保护区内历史建筑的有效利用,特别是当对城市空间的总需求大为减弱的时候。规划师们发现,以消极的控制方式进行管理,吸引所期望的功能比阻止对建筑不合意的使用要困难得多。

在大多数国家,从单体建筑保护发展到区域性保护,从着重于简单的控制性保护策略转变为注重历史街区功能的振兴、发展和强化,这一过程十分迅速。同时,从专业的角度关注保护的已不再局限于建筑师和艺术史学家,还包括了规划师和从事经济开发的人。保存单体建筑及其空间的确是开展保护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逐渐地,保存与保护的概念也从针对一些个别项目的特殊处理演变为城市规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若干孤立的纪念性建筑扩展到整个城镇景观和街道形态时,一系列的功能要素就清晰地突显出来:“当前与未来的土地利用、交通系统、地区人口及社会结构等,都包括在实施保护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中”(Ashworth and Tunbridge, 1990, pp.14~15)。

由此导致了第三次保护思潮的出现,即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特别的和地方化的保护政策。新政策更加注重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振兴城市历史保护区和街区。工作的重点放在促进投资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从而为街区保护和改善提供所需的经济支持。早期的保护政策更多地关注维护遗产本身的历史特性

(pastness of the past), 而以后的保护与振兴政策则更注重遗产的未来。任何在城市历史街区中的振兴尝试都要审慎地考虑其文脉与环境, 因此必须处理好难以阻挡的经济发展的需求与为保护物质景观而使这种发展受到限制和控制之间的矛盾。在这些地区, 协调保护与振兴的不同需求的力度, 以及在尊重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平衡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极具挑战性。本书通过调查一些城市历史街区保护和振兴的过程、冲突及其结果, 试图将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予以综合审视。

考文特广场

考文特广场 (Covent Garden) 位于伦敦西区的中心。该项目开始时只是注重对历史遗产的保护, 但人们很快认识到实施城市振兴才是问题的关键。考文特广场保护项目的成功也归功于各个公众团体和其他活动家的广泛参与。广场的标志性建筑是集贸市场, 它不仅是其周边苏荷区 (SoHo) 及考文特广场地区的象征, 同时还是



图 1.3

考文特广场中的市场建筑群。始建于 1830 年,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将其中三栋建筑改造为一个节日市场, 考文特广场是整个考文特广场地区的中心。

地区整体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图1.3)。考文特广场原是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于17世纪早期设计的一个开放型广场。1670年经查理二世赞助,在广场右边建造了一座市场,而目前的市场建筑本身可追溯到1830年。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考文特广场就像一个大规模的商业开发用地,主要的开发计划是由大伦敦委员会(the Great London Council, GLC)支持和提供的。然而,就像拉文茨(Ravetz, 1980, pp.102~103)所描述的:“这曾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混合区。特色商业、住宅与花卉蔬菜批发市场及歌剧院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将被一个由道路、旅馆和会议中心组成的宏大计划所取代。”

但是这项开发计划遭到当地商人、居民和保护者的联手反对,他们担心重建之后会失去历史建筑及其特征。他们的反对在1973年取得了胜利。在一次公众质询之后,大伦敦委员会提出的颇有争议的滨河道路改造计划因拆除量过大而从大伦敦初步开发规划中删除。不过在1974年考文特广场仍然被指定为综合开发区,并且在年底将市场建筑迁建到远离伦敦中心的新用地。坎塔库济诺和勃兰特(Cantacuzino and Brandt, 1980年p.56)评论说:“仅仅在24小时内,多彩、诙谐、喧闹、拥挤、残破的市场消失了,考文特广场遭到开发商和道路工程师的肆意践踏。”

也就在同一年,保护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为负责环境事务的国务大臣列出了一张包括200栋建筑物的名单。宾尼(Binney, 1984, pp.136~137)相信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国务大臣(the Secretary of State)肩负法定的职责,对具有建筑及历史价值的建筑物进行登录。他不能因为其他方面的考虑,例如潜在的再开发价值或其他政策性考虑而简单地拒绝将这些建筑物列入保护清单。从此以后,在讨论任何拆除计划时必须考虑到保护的需求。根据最后认可的100多栋建筑清单,国务大臣有效地阻止了考文特广场的大规模再开发项目,并要求规划师重新考虑其规划方案。

1978年发表的《考文特广场区行动计划》使考文特广场最终避免了被改为一个办公区的命运。在这个文件中,大伦敦委员会(GLC)下属的考文特广场管理委员会承认并尊重该地区独特的品质及其对伦敦中心区生活的潜在贡献。随后,新的规划突出了历史保护的重要性。虽然对许多建筑的保护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在其后的振兴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更多问题且情况更为复杂:不仅需要为这些历史建筑寻求新的功能,还要使它们得到良好的维护;街区的街道只有依靠吸引人和各种城市活动才能变得生机勃勃。考文特广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这里一直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它地处一座世界上最繁忙的旅游城市并且靠近伦敦西部已建成的娱乐区。本书中将要讨论的许多其他街区都不具备这些优势。

城市历史街区

当代的或后现代主义¹的城市设计与规划强调地方文脉的重要性,力图在设计中延续地方特色、历史肌理和传统街道模式。罗宾斯(Robins 1991, p.34)说:“现代主义规划强烈地表现出普遍性和抽象化的倾向,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场所感,重新激活并振兴街区的地方性与特殊性品质”。其中一种日渐流行的思想就是引入城市街区(urban quarters)的概念,这种概念在更为具体化的英国文脉中称为“都市村落”(urban villages)。此类街区的要点在于具有相对较小的尺度、混合功能、良好的步行环境(满足但不鼓励使用汽车)、不同类型与尺度的建筑以及使用权的多样化。许多欧洲大陆城市的传统多功能区都符合这个概念,巴黎的马赖(Marais)街区和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城市)的中心区就是如此。可以说这种关注反映出对不断丧失的地方感与传统特色的忧虑,并唤起对“社区”的思念。许多城市都有不少特色独具的街坊,像伯明翰(见BUDS, 1990)和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城市区域委员会CGDC, 1992)这样的城市,已经在近期的规划中明确提出保护地方特色及其内在个性,采取各种政策来提高和强化那些独特而多样性的地方感。

巴黎的马赖街区与博洛尼亚中心区的振兴都是本书研究的案例。在欧洲大陆,多功能的混合街区具有悠久的传统,工作场地与居住用地相互交织。但是由于工业化发展的方向不同,这里很少像美国和英国那样建有大尺度的仓库和工业建筑。因此,这些大陆街区的建筑形式和城镇景观也是不同的。相比之下,许多英国和美国的都市街区不是典型的居住街坊,它们中的大部分是19世纪的工业区,以加工、制造、仓储或运输等功能为主。

本书中所提到的街区也包括具有重要景观价值的城市历史肌理。位于大西洋两岸、英美两国现存的体现19世纪巨大财富的工业建筑在本书的案例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它们大部分是牢固的砖石建筑或是早期的钢或生铁框架结构,外表面通常包覆着砖或大理石。这些坚固的建筑产生一种强烈的个性与特征,还界定出一个富有意义的时代和场所。正如福特(Ford, 1994, p.113)所言,“当人们一提起重工

1 本书提到了“现代运动”和“现代主义”(以大写形式出现)。这些名词在建筑和规划领域有相对一致的指代(即勒·柯布西耶、雅典宪章、包豪斯、机器时代和工业美学等)。在现代主义之后各种运动纷呈,我们用后现代主义(小写形式)来说明现代主义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而用后现代主义(大写形式)来指代由查尔斯·詹克斯(1977年)在《后现代建筑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 Modern Architecture*)一书中提出的后现代建筑风格,以示区别。

业这个词就不由地皱起眉头，脑海里浮现出那种黑烟滚滚的烟囱和山一般的炉渣堆，而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建筑却如纪念碑一般卓尔不群。在1800年代晚期兴建的办公楼、旅馆、百货公司及公寓建筑以夸耀财富为特征，这也影响到许多大工厂和仓库的风格。”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旧金山的吉拉德哈里（Ghirardelli）广场和纽约的苏荷（SoHo）区等地的历史保护保持了“工业时尚”的特征，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而且，对库房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比对那些重要的经典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容易得多，后者需要进行十分专业的修整，对功能的置换也受到更多的约束。

本书讨论的重点在于街区或城市地区。对城市设计与规划的关注超过对单体建筑和构筑物的关注，特别是对那些在较小范围内集中了相当数量历史建筑的地区。我们有很多失落感，因为已经失去了很多再也无法重建的东西。这些损失有一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但更多的是因为战后重建和大规模的综合性的开发。这使这类地区的价值更显宝贵：它们是无可代替的。近年来，人们已经通过多种手段对其进行保护。

现在，已经不会对历史街区进行大规模的拆除和再开发，历史建筑也不会被破坏，然而历史建筑原有的和目前的功能仍在逐渐衰退，甚至从城市的历史景观中消失了。这些地区需要具有一些有用的城市功能，而不是仅仅保持那种脆弱或几乎荒废的空间形式。在本书第二章中将会探讨城市历史街区中特殊的经济问题以及吸引投资、促进街区自身发展等一系列课题。当前，19世纪的工业区之所以受到特别关注，是因为它们具有转换使用功能的潜力，能够适应新的城市需求，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它们的个性。如果它们不再或不能保留工业（制造中心）的功能，那么它们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适当的功能呢？除了马赖街区和博洛尼亚市中心外，本书所展示的大多数街区正在改变其特征，比如从（原先的）工业区变成办公以及各种消费场所，像零售、休闲和旅游等等。当然也存在着发展或保留居住功能的压力和要求，尤其是在工业建筑和低端办公房产市场的转化过程中。这类街区也倾向于采用多种不同的土地权属方式，经常是拥有很多较小的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将土地高度集中于相对较少的人手中。在欧洲，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往往是政府机构，它们获得并聚集土地，进行不同形式的开发或整个地区的综合性的开发。但这种土地拥有方式最终被取消了。

在较敏感的文脉和环境中的进行的振兴努力会格外关注修复和重新开发中的设计质量，以及建筑之间的公共空间的质量。本书尤为注意探索在城市设计和城市振兴之间的分界，特别是在第三章和第七章。

城市街区的定义

在考虑城市历史街区的物质要素时,尺度是一个重要内容。本书主要关注那些保留了历史完整性和内聚性的街区,而不是更大空间范围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碎片。格拉茨(Gratz, 1989, p.258)指出:“历史街区保护常常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往往所修复的东西对城市整体文脉来说微不足道,而且因所涉及的范围太小,以至于难以保留或再次成为更大城市结构中重要的历史文脉发源地”。她还说:“当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沃思堡(Fort Worth)、亚特兰大、圣迭哥、圣路易斯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城市在炫耀其市中心那几个被修复的街区时,市中心的其它部分却陷入被推平与重建的梦魇之中”。

圣路易斯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1939年,吉迪恩(Giedion, 1947, p.130)曾经见到过一个有着大约500栋建筑的完整街区,其中一些是极为精致的铸铁建筑。他注意到,“目前半荒芜的滨河地区已成为美国发展史上一段最激动人心的时期的见证。其中的一些商业建筑呈现出远高于同时期一般标准的建筑特征”。然而它们的命运很快走向终点。到1947年他的书再版时,吉迪恩在一则注脚中哀叹滨河的40个街区因建造杰斐逊国家纪念馆而被联邦政府拆除。这个历史性的滨河区仅有九个街区保留下来,以圣路易斯市的建造者拉·克莱德(La Clede)的名字命名(图1.4)。

有三种方法可用来限定或确认街区的范围:即划定物质边界(physical boundaries)、独特的街区个性和特色,以及通过功能和经济方面的关联性等。

边界

街区可通过模糊的或明显的边界来限定。边界可凭借一种明显的地貌来限定,也可依据自然的障碍物或地界,如一条河流或一条繁忙的马路来限定,或为了管理的方便而人为决定。边界可能自然形成,然后为了管理的目的而加以规范。与此相对应,一个历史街区的外廓也可能影响它以后的特性。这种特征也许与历史保护区的边界相吻合,也许不相吻合。具有清晰边界的街区有助于强化这个街区的认同感,便于街区内部功能、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因素的互动,还能够促使这些不同方面的共同发展。所以,当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 1961)论及邻里(street-neighbourhoods)时,认为它们的成功大部分依靠各种城市活动的重叠和交织。而试图准确地限定城市活动的边界是无用的,因为无论它们最适合在哪里发生,都会无始无终地自成一体。



图 1.4

圣路易斯的克莱德码头区，由狭窄的32英尺的街道分割为九个街区，是圣路易斯河岸边保留的最后的历史区域。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对建筑进行复原和修整，使之成为现代城市中建筑与环境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它们仍保留与城市中心隔离。

特征与个性

林奇（Lynch，1960，p.47）在他的城市意象组成元素分类中，把街区定义为“城市的中型到大型组成部分，设想它有二维平面范围，观测者在心理上进入其“内部”，这两个平面因一些共同的、有个性的特点而被识别出来。它们一般从内部看